

## 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与面临的挑战

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周边战略不仅事关中国的稳定发展环境，而且还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与方向。因而，围绕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我们至少要考虑下述约束条件：一是要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即为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二是要服从和平崛起的大方向；三是要与中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保持一致性和互补性；四是要符合周边地区或亚洲的发展趋势，为周边国家带来收益并为他们所接受；五是要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充分发挥中国的战略比较优势。为此，我们可以把这一目标概括为：以经济为纽带促进本地区的一体化，提高中国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力。做出这种概括的依据主要来自于下述判断。

第一，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意味着经济规模与综合国力的提升，而且也意味着对国际规则或国际秩序有更大的影响力。中国的周边战略目标必须置于和平崛起的背景下来分析。在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中，中国首先要成为地区大国。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表明，我们已经从国际规则的旁观者发展为国际规则的遵守者，未来必须要成为国际规则的参与制定者。因而，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必须落脚到对地区秩序与规则进而是全球秩序与规则的影响力上。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谈不上和平崛起。目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主流看法是，中国经济规模赶上并超过美国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其真正担心的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之后会挑战或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这一方面反映了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竞争的焦点；另一方面也昭示了中国需要明确对国际秩序与规则的利益诉求。

第二，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与地区事务的战略比较优势仍然在经济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忽略或放弃在非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相反中国需要加快构建在非经济领域的战略比较优势。首先，和平崛起战略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以战争手段实现民族复兴，自然也不能以战争手段确立中国的地区大国地位。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以战争手段实现和平崛起并不等于说中国不应

该发展自身的军事实力。其次，由于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依靠政治理念获取地区大国的地位是不可行的。现阶段，多数周边国家实施的是西方民主制度，不能期望他们认同并接受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相反，近年来西方国家日益在周边地区不断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作为抗衡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种选择。最后，相比之下，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与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的战略比较优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周边绝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与投资的来源地。

第三，处理好中美关系是中国周边战略的首要任务。中国和平崛起的起点是要成为地区大国，同时中美之间的竞争也首先会集中于周边地区。看起来美国并不在中国的周边范围之内，但中国周边战略所面对的所有矛盾与问题却都与美国息息相关。作为守成国，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重点是亚太地区，其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导向。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中，中国的战略比较优势同样在经济领域，而不在非经济领域<sup>1</sup>。基于地缘优势，中国有条件大力推动本地区内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与跨国界基础设施合作，如铁路、公路、油气管道、港口、海上运输通道、河流航运等建设。基于金融优势，中国有能力推动本地区基础设施金融开发机构、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签署货币互换协定以稳定本地区金融体系的稳定，等。

第四，推动亚洲一体化进程具有内在的驱动力。进入本世纪以来，区域主义已经逐渐取代多边主义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世界主要大国也都从奉行多边主义战略转向奉行区域主义战略，并以区域主义为手段扩大对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的影响力。与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的一体化进程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较低，但客观上这一地区的经济又存在合作与一体化的强大动力。例如，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使本地区的产业分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中国又是这一分工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再如，这一地区的多数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发展水平与发展模式具有相似性。他们不仅有广泛的区域合作空间，而且在全球事务中也有相似的立场。鉴于这些国家均属于出口导向型模式，而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及其发展方式的调整，中国将能够为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市场与驱动

---

<sup>1</sup> 在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对 2030 年全球格局所做的预测中，到 2030 年中国经济规模将明显超越美国，但在中美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美国在非经济领域仍然对中国占居着优势，其中在军事领域占居绝对优势，进而在综合国力上占居优势。参见，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12)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力。

要实现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目前，实现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面临一系列严重的外部约束与挑战<sup>2</sup>。

其一，区域内外的大国都在调整其亚洲战略。近年来，伴随中国的崛起与美国重返亚太，大国的亚洲战略调整已经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趋势。印度的“东向”战略正在完成其“升级版”，从东盟跨越到日本，从介入东亚的陆地事务到介入东亚的海上事务。日本国内政治的右翼化已经全面延伸到其对外关系领域，安倍政府的“价值观外交”与“围堵中国战略”已经成型。俄罗斯对外战略重点已经开始从欧洲导向扩展到欧亚导向。澳大利亚明确宣称对外战略的重点要融入“亚洲世纪”。即使是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盟也没有放弃以自由贸易区为桥梁加强与亚洲的合作关系。大国的亚洲战略调整实为对华战略的调整，因而中国的周边已成为全球大国的竞技场。

其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正在打破周边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政治上，美国以美日同盟为基础强化其亚洲同盟体系；军事上，增加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借助日本的“正常国家”诉求，扩大其军事影响力；经济上，以 TPP 为平台，吸引更多的亚洲国家参与其中，客观上已经打乱了亚洲原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尽管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尚未完全确立，财政负担与债务上限之争已成为其国内最大的政治问题，与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已经启动，中东事务继续拖累美国的外交政策，但这并不会改变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进程。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应对中国的崛起是美国 21 世纪美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

其三，中日对抗关系走向持久化。中国周边战略面临的最直接挑战当属中日关系。无论是充当中国和平崛起的朋友还是对手，日本作为中国最重要邻国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钓鱼岛争端看似是对一组无人小岛的争夺，实为中日对亚洲大国地位的争夺。中国的迅速崛起改变了日本对华关系的基本定位，同时也成为日本（打着“中国威胁论”的旗号）修改“和平宪法”，成为“正常国家”的最好口实。在应对中国崛起这一点上，美日之间取得了共识。这也是美国放任日本走向右翼化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意义上，中日关系和解的可能性极小。中日对抗关

---

<sup>2</sup> 本文不讨论实现中国周边战略目标的内部约束，尽管这种约束至关重要，如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周边外交政策选择与国内利益集团的关系，周边战略目标与国内政治经济目标的关系，等等。

系走向持久化将为许多周边邻国实施骑墙战略提供条件，尤其是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会借机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基于上述判断，中国周边战略的实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极为严峻的。其目标能否顺利实施将决定着中国整个和平崛起的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李向阳